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7

王鴻仁譯

一九一三年

（印度）拉賓德拉納斯・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泰戈爾怎麼獲得一九一三年的諾貝爾獎呢？這跟「吉坦佳莉」（Gitanjali）這部詩集有很深的姻緣。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在「吉坦佳莉」付印之前，畫家羅森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曾將該書的手稿拿給詩人葉慈過目。後來葉慈又將它傳給詩畫俱佳的摩爾（Thomas Sturge Moore）。摩爾是當時英國皇家文藝協會裏頭的一個要人；他從一九一二年起便開始負責一項至爲艱鉅的任務：爲英國爭取諾貝爾文學獎。按理講，葉慈本當出面推薦泰戈爾才對，可是，或許他認爲他喜歡泰戈爾純粹是出乎個人的偏愛，缺乏客觀的判斷，因此他沒有這麼做。推薦泰戈爾的公函於一九一三年從英國寄出，署名者爲摩爾。

其實，英國最主要的候選人並非泰戈爾，而是哈代。簽名支持哈代的英國文人多達九十七位。

那年總共有二十八位重要性不等的作家參加角逐。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羣人支持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os），他的推薦書上整整有七百個簽名。義大利的主要候選人是德蕾達（一九二六年得主）；瑞士再度推出史比德勒。丹麥、芬蘭、瑞典和比利時也都紛紛推出候選人，競爭相當激烈。法國一本往年的作風，推出兩位當時巴黎文壇的風雲人物：史家拉維賽和小說家羅逖。法朗士則是由德國方面提名的。

看了這份名單，我們不禁要爲這位來自遙遠東方的詩人捏一把冷汗：他會不會被這麼多强有力的西方競爭者所淹沒呢？事實並未如此。這都要歸功於瑞典學院的公正態度。

泰戈爾的運氣相當好。瑞典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裏頭剛好有一位懂得孟加拉文，而且對他的名字也頗爲熟稔的東方語文專家。在那幾年當中，瑞典學院的內部略略有了一些變動，老一輩的院士相繼凋萎，於是年輕一點的院士們逐漸漸的多了起來。而泰戈爾的獲獎正是得力於這種情勢。學院院士當中支持泰戈爾最力的是一位在瑞典頗負盛譽的詩人，海登斯坦。

海氏本人後來也得過獎（一九一六年），所以關於他的事情此處可以暫且按下不談。海登斯坦對泰戈爾的「吉坦佳莉」極爲贊賞。那部詩集裏頭的濃厚東方氣息和他自己早期的詩風頗爲相近。於是他就提筆撰寫了一份內容極爲紮實的報告書，送給他的同事們做爲遴選得獎人的參考。

他這篇報告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位與海登斯坦同輩份的作家也提出了一份熱情洋溢的研究報告。當時諾貝爾委員會的成員不外是些大學教授、主教、官員，以及已經停筆的老詩人。在這個委員會裏頭，只有海氏和那位作家仍活躍於當時的瑞典文壇，因此他們的意見極有份量。在他們的影響下，瑞典學院的院士們開始競讀「吉坦佳莉」，而無不爲詩中那些富於韻律美的意念所折服。於是乎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諾貝爾委員會原先是屬意華固愛（Emile Faguet），然而委員會這項建議却被學院以全票否決了。因此諾貝爾委員會遂於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再度開會。這次與會的委員總共十三位，而投票支持泰戈爾的竟達十二人之多。

泰戈爾在一個西孟加拉的小村裏主持一所叫山汀尼開丹（Santiniketan）的學校。那是一個夕陽西下的時分，大師帶着學生們從森林裏遠足歸來。當他們路過村裏的郵局時，一個職員衝了出來，遞給他一封電報。泰戈爾漫不經心地將它塞進口袋裏。可是報務員熱切地堅請他立即折閱。學生們在旁凝神諦聽。那時他們感到何等的驕傲啊！他們的老師獲得了一項世界性的殊榮——「由於他那至爲敏銳、至爲清新而又至爲優美的詩篇。藉着它，藉着高超的技巧，藉着他自己的英文，他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變成爲西方文學的一部份。」

頒獎典禮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舉行，可是泰戈爾並未列席。主辦當局只好悵然接受他的致歉電報：由於「半個地球的遙遠距離」，他無法登上領獎台。可是一九二一年春，泰戈爾終於達成了一遊瑞典的心願。他在斯德哥爾摩受到了無比熱烈的歡迎。在瑞典人的心目中，他簡直成了一個 Magus（東方聖人）。小學生們向他唱歌致敬；每次演講，聽衆都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甚至連國王古斯塔夫都親自前往捧場。瑞典學院特地爲他安排了一次宴會。當時這位貴賓的頭髮和鬍鬚都已經變白了，然而他的作品不僅要比一九一三他獲獎時更豐富，同時也更臻完美，更爲人們所喜愛。

一九一四年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停頒一年）

一九一五年

（法國）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一九一四年，瑞典已不再是個世外桃源了。這個小小的中立國也隨着整個歐洲進入了戰爭狀態。波羅的海及北海沿岸的燈塔不再放射光芒。教堂的鐘像古時候打仗一樣，敲個不停。爲了要捍衞國土，瑞典的壯丁都應召入伍。甚至連民防團也動員了。那是一支由四十歲以上的平民所組成的軍隊，穿着五花八門的戎裝。這些人雖然戰技荒疏，可是士氣却高昂得令人感動。時間彷彿往後倒流了，因爲士兵們都戴着查理二世時代（一六六〇——八五）的三角帽。而敵人還是和過去一樣——還是俄國，沙皇統治下的「永恆的俄羅斯」。俄人對斯堪地那維亞的政治野心及刺探活動使得北歐輿論爲之嘩然。哥薩克騎兵開進了東普魯士。大礙在坦能堡（Tannenberg）怒吼着。德國宣傳機構的甜言蜜語使北歐親德派人士的熱血沸騰不已。

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處理諾貝爾獎呢？事實上，在大戰尚未爆發之前，諾貝爾基金會便已決定將頒獎事宜展延至一九一五年六月。這是一項很切實際的權變措施。不過，改變頒獎日期的決定還有另一項背景。每年都有人呼籲——而且這項要求一年比一年迫切：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應該在比較暖和的日子裏舉行。十二月十日正值隆冬：寒不可當，因此許多人盼望能將頒獎日訂在北歐氣候最宜人的時節，好使它成爲一個「可以到戶外慶祝的國定假日」。

諾貝爾委員會還是採取往常的步驟，按規章處理那些在一九一四年元月三十日前後寄到的推薦書。候選人共有二十四位，其中除了幾位新人外全都是捲土重來的老手，然而沒有一個特別搶眼的。經過慣例性的磋商之後，諾貝爾委員會的委員們大致屬意瑞士的候選人史比德勒。史氏並不是一個生手，他以前曾爲

一些德重士林的權威人士所推薦。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十月六日，一位厄普沙拉大學的史學教授提出了一份審查報告。這位學人頗有政治眼光，而且在瑞典聲望極高。他認爲，在這種時刻頒獎對於瑞典的中立形勢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他說：「在目前我們所處的時刻中，學院發覺遴選得獎人的責任沉重無比，因爲這項抉擇裏頭隱伏着一個危機：這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萬一處理不當而引起誤會的話，勢將爲瑞典招來新的敵視與新的忿怒。」

一九一四年秋的連串事件使這項爭論更趨白熱化。人們認爲，在這種時刻慶祝「民族間的和諧」是很失當的。這類型的典禮或儀式必然會被認爲是一個殘忍的玩笑。小小的瑞典國愈來愈須堅守中立，而不要被捲入列強的糾爭——這正是當時瑞典全國一致的想法。於是一九一四年的獎金遂被保留——後來基金會決定將這筆款項撥給諾貝爾圖書館。

這樣做是否正確呢？意見並不一致。許多團體指控瑞典學院瀆職。它不該抱着這種畏葸的態度。它應該奮身而起，痛斥野蠻的戰爭。它應代表和平；它應照常頒獎，以抗議戰爭。如果它敢於如此，則它將顯得更高貴。在普世陷於黑暗之際，瑞典實有義務高舉光明的火炬。這個未遭戰火荼毒的北方小王國應善用其得天獨厚的條件爲世界的安定與和平舖路。尤其在文化的領域中，「中立更應轉化成一種具有肯定價值的東西」。

幾年來——甚至幾十年來，德國一直不露形迹地在寧謐的瑞典鄉村進行滲透。因此，瑞典人民的許多想法都發散着濃厚的親德情愫。德國人的宣傳手法非常高明，收效也相當大：瑞典人十分鄙視法國文化。在他們眼中，法國是一羣放蕩、漫浥的個人主義者的聚居地。法國文學：低級。法國哲學：膚淺。法國的藝術界盡是一些像吐魯玆・羅垂克（Toulouse-Lautrec）之流的畫家；法國畫的題材永遠是「戴着黑手套，坐在餐廳裏，愁眉深鎖，若有所思的女子」。

在這個苦難的時代裏，羅曼・羅蘭孜孜不倦地從事一種嚴肅而眞摯的文學。這些作品有很多都是發表在「兩週雜記」（Cahiers de Quinzaine）上。他不僅藉着這些作品痛責盛行於當時的妖言邪說及陳

腔濫調，同時還透過它們向世人展示一個眞正的法國——一個充滿熾烈良知與高尙情操的法國。他孜孜不倦地在祖國的遺產中找尋一些今日已不復得見的價值：清晰的思想、犧牲的胸懷，以及信仰的力量等等。他是一個慘遭攻擊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流落在日內瓦的法國人。可是，他確實是懷着一種「兼愛天下」的胸襟來爲他的祖國効力——而從這方面的成就言之，沒有一個法國作家能望其項背！

羅曼•羅蘭的著作在瑞典吸引了許多法國及協約國的友人。「約翰•克利斯朶夫」這本書感動了不少人。瑞典自由派麾下的一家大報(Dagens Nyheter)刋載了羅氏「超乎戰爭」裏頭的部份文章。這位孤立無援的法國作家在瑞典有許多忠實的筆友，其中包括一九〇九年的得獎人拉格洛夫，而交誼最篤的則爲齊愛倫(Ellen Key)。齊愛倫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她的思想乃是奠基於深厚的歐洲文學根底。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後，一系列羅氏作品的翻譯本在瑞典出現了。最早的一本是「約翰•克利斯朶夫」，不久，「革命論」及貝多芬、托爾斯泰評傳也跟着問市。

以上便是羅曼•羅蘭問鼎諾貝爾獎的背景。他是由厄普沙拉大學的文學史教授修克（Henrik Schück)於一九一五年推薦的。修氏雖然也很熱衷政治，不過大體說來，他是以學識淵博著名的。諾貝爾委員會十分重視羅曼•羅蘭，因此在處理他的推薦文件時也就格外小心。他們認爲這個作家充滿了矛盾，他的作品從藝術的觀點看來，非常不平衡。然而並非所有的院士都不欣賞，仍有部份院士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的言論不僅極有影響力，而且也十分扣人心絃。熱烈支持羅曼•羅蘭的人士們指出：他和該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選人加爾多斯比較起來，顯然要優越些。

想要確保中立確實是需要靈活的手腕。瑞典爲了要確保中立，所以將一九一五年的獎金又給保留了一段時間。

會議於次年繼續進行。却因爲新的爭論和新的建議而顯得更爲熱切。瑞典接連兩次將頒獎事宜往後延期，人們已經開始嘖有煩言了，人們認爲：卽使戰爭仍在進行，學院還是應該懷着故捐款人諾貝爾先生的

理想主義，來履行頒獎的責任。

與論對羅曼•羅蘭愈來愈有利。如今他已經獲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了。就是一些非常不喜歡捲入激辯的人們也都出面替他說話。於是，在十一月九日那天，瑞典學院終於決定同時頒發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兩屆的獎金。這個辦法頗帶有一種「所羅門王式」的意味：一個頒給提倡國際主義的羅曼•羅蘭，一個頒給代表民族主義的海登斯坦。海氏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國際聲望，他的獲獎純屬瑞典國內的盛事；羅曼•羅蘭在世界文學史上則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他的獲獎乃是國際文壇上的一樁大事。

瑞典公使交給羅氏的信上這麼說：「學院迫切希望閣下接受此項敬意：學院的此項決定必然會爲知識界每一位具有獨立性思想的人們所稱道。」在作者身後出版的「大戰日記」裏頭，人們可以找到他對這項好消息的反應。這項消息發佈時，他正客居日內瓦。最先打電報將這件事告訴他的是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他拒絕領獎，因爲他擔心會妨碍他的自由，另一方面會招來新的迫害。可是那個星期三，也就是十一月十五號，事情却突然的明朗了起來。他流亡期間的契友周維（P.-J. Jouve），爲我們描寫了那天的情景：「在他的房間裏，一小羣流亡者，宛如一座雖狹窄然而十分敬虔的友誼之教堂，圍聚在他的身旁；他們代表着羅曼•羅蘭散佈在世界各地的無數友人。旅舘裏十八世紀的客廳，羅曼•羅蘭坐在一架鋼琴之前：音樂，最能令人忘憂。那些偉大博愛的音樂家，以他們靈魂深處的祝福，團團圍住他們的子女之一——羅曼•羅蘭。」

羅氏接受獎金之後，將它捐獻給紅十字會和法國的福利機構。實際上，當時的他最最關切的乃是法國。許多人前去向他道賀。其中有一羣被拘留在瑞士的協約國軍人（註）。他向他們表達了自己的謝意：「這項殊榮並非頒給我個人，而是頒給我們的祖國：而我正是因此而接受它。同時，每當我想到它有助於傳播那些使法國爲世人所愛的思想時，便感到無比的欣喜。」

他在那封致瑞典學院的謝函中，也表達了相同的心意。我們在信裏聽到了一個多年來一直被他的同胞所鄙斥的聲音在爲他的祖國辯護：「諸君對我三十年

工作之抬愛，使我爲我的祖國感到驕傲。我要恭敬地將這項殊榮獻給她：因爲我的理想主義，我對人類友睦的堅定信心，都要歸功於她。我只是理性、容忍以及悲憫精神的一個極爲笨拙的詮釋者及忠實的僕人。這些精神乃蒙田、伏爾泰以及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之遺產。容我感謝諸位在此流血的時刻中這此項可敎的表決。不管我們現在的處境是如何的悲慘，然而諸位的決定使我們更有希望獲得未來的智慧及一個和諧的歐洲。」

在這黯淡的幾年中，頒獎典禮，取消了，而且也沒有人有心思邀請得獎人到斯德哥爾摩來。可是羅曼•羅蘭一直和學院保持聯繫。而且，爲了表示謝忱，他將「約翰，克利斯朶夫」的原稿送給他們。雖然這部體積至爲龐大的稿子現在存放在羅曼•羅蘭紀念館裏面，可是所有權迄今仍是屬於瑞典學院。羅曼•羅蘭紀念館座落於巴黎，那是法國人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爲紀念羅氏的成就而建的。當你去那兒參觀時，還可以看到羅氏的諾貝爾獎狀，上面記述着瑞典學院當年所以頒獎給他，是因爲「欲褒揚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義。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際，所表現的同情與忠實。」

（註）國際法規定：在戰時進入中立國之軍人要被拘留在該國內，直至戰爭結束。

張伯權譯
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四版）
噢，父親（二版）
俄羅斯文學史
卡繆札記（與范文合譯）
楓城出版社印行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